

日本与国际秩序变革：观念与应对^{*}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

内容提要：秩序问题是国际关系的核心。科学判断和系统把握国际秩序变革中日本与世界的关系，应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加以考察。从历史视域下日本国际秩序观的演进、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认知以及“百年大变局”下日本对秩序变革的应对三个方面来分析日本的相关认知与实践，发现：“华夷秩序”下的日本，基于实用主义原则，在尊崇秩序中心的同时努力维护自身独立性；到近代，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日本谋求摆脱、参与颠覆“华夷秩序”，实现“脱亚入欧”，继而又从欧美主导秩序的追随者转变为挑战者；经历战败、美军占领、民主化改造后的日本，选择接受并融入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并保持动态调整、努力趋利避害，形成独具特色的国际秩序观。百年大变局下，日本致力于提升“综合战略活跃度”，修补陷入危机中的国际秩序，其与秩序的互构关系既体现了历史延续性，又呈现出新特点。

关键词：百年大变局 国际秩序 日本 秩序认知 战略应对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课题组组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成员有金莹研究员、张勇研究员、吴限副研究员、张梅助理研究员、陈静静助理研究员。

文章编号：1002-7874 (2021) 01-0001-32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优势学科建设”日本政治学科（编号：GJ08_2018_YCX_3918）。

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于秩序，即秩序如何设计、如何打破、如何重新创建。^①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②，国际形势加速演变，政治多

^{*} 感谢《日本学刊》编辑部和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① 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28页。

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趋势深入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持续深刻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国际形势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国际社会要求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呼声高涨。^①

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离不开国际社会、寰宇生民群策群力，采取真挚、积极的共同行动。日本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也是中国的重要邻邦。对日外交既是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的秩序观念、战略应对与未来国际秩序调整之间具有明显的互构关系，值得高度重视，亟须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在全面考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予以准确把握、系统阐释，在科学总结历史规律、客观研判当下形势的基础上精准预见其未来走向。

一、日本国际秩序观的历史演进

现代国际秩序被认为肇始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于 1648 年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不仅宣告首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诞生，同时也确立了国际政治中应遵循的以会议和对话解决争端以及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重要原则，^② 使欧洲大陆形成了一个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于欧洲之际，在东亚，区域性国际体系“华夷秩序”已历经千余年的历史。华夷秩序以中华文明为中心，将周边国家纳入其中，发轫于秦汉，终结于晚清。该秩序通过“朝贡”和“册封”构建起等级关系，通过王道、德化等儒家价值秩序观维系体系的有序运转。日本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该秩序，并由此形成其国际秩序观的原胚。16、17 世纪以来，在中国封建朝代更迭、西方文明东渐等一系列内外冲击下，华夷秩序逐渐失去对东亚的统驭能力，

^① 相关内容参见杨洁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求是》2021 年第 1 期，第 24—29 页。

^② 这一体系确立了许多沿用至今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诸如国家主权原则以及基于主权的国家间平等，条约必须遵守和对违约方进行集体制裁，否定了中世纪教会法规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将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交由主权国家的政府来处理 and 承担。参见朱锋：《“百年大变局”的决定性因素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 年第 5 期，第 83 页。

历经震荡并最终解体。面对东西方两种秩序的碰撞，日本基于实用主义原则，选择了一条摆脱乃至颠覆华夷秩序、谋求“脱亚入欧”的道路。通过“贪婪地”摄取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日本积极地融入西方国际体系，在果断实现国际秩序观和发展模式的转换后，尝试建立以本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在此基础上角逐全球秩序霸权。

（一）华夷秩序下的日本：尊崇与游离

华夷秩序以东亚大陆中央王朝为核心，范围涵盖东北亚和东南亚等次区域，其内在演进逻辑是彰显王道、德化、兼爱、非攻等中华文化价值，依从“卑下”和“边缘（夷）”依附“尊贵”和“正统（华）”的华夷关系规则，通过“册封”和“朝贡”手段，将中央王朝影响所及按照血缘关系的浓淡、地政关系的远近、文明程度的高低、武备能力的强弱、经济实力的大小和道德水准的高低等诸标准，构成一个时空庞大的“权力—义务”关系网。^① 华夷秩序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具有高度等级性，但又并非西方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是以文明和文化亲缘性为衡量标准。日本学界认为，在华夷秩序中，中华文明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中国通过向周边国家传播文明而令其自发性地臣服，是非常节约成本的。在实际操作层面，为维持秩序通常采取的手段就是“册封”和“朝贡”。中国皇帝以“册封”的形式任命朝贡国的统治者为国王，向中国称臣的朝贡国要向中国皇帝“朝贡”，中国皇帝则会行回赐之礼，以此象征上下臣属关系。^②

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57年，日本倭奴国就曾向中国朝贡，汉光武帝赐予其金印。645年，日本实施大化改新，全面仿照中国律令建立起日本的律令制度。日本对中华文明的尊崇和对唐王朝的向往成为改新的动力所在，长期派遣唐使赴华系统地学习和吸收中华文明，也为改新奠定了一定物质基

^① 中国学者何芳川、韩东育等系统论述了华夷秩序的内涵与特征。参见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第30—45页；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第2—33页；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45—46页。美国学者的相关论述参见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8页。日本学者的相关论述参见：宫崎市定『宫崎市定アジア史論考』（上中下）、朝日新聞社、1976年；浜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岩波書店、1997年；西嶋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体制』、岩波書店、2002年；飯田敬輔など編「特集 主要国の国際秩序観と現代外交」、『レヴァイアサン』2016年4月号、木鐸社、13—14頁。

^② 飯田敬輔など編「特集 主要国の国際秩序観と現代外交」、『レヴァイアサン』2016年4月号、木鐸社、14頁、18頁。

础和心理准备。这是身处华夷秩序中的日本以追赶中国为目标，自我强盛的一次重要改革。通过此举，日本不仅逐步建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也追随中国进入了制度文明的历史发展新阶段。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主导的东亚地区秩序中，与朝鲜、越南等中国周边国家相比，日本长期特立独行，对中日关系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抵制并最终挑战华夷秩序。^① 据何芳川考证，自唐朝末年停罢遣唐使后的数百年间，日本一直游离于华夷秩序圈之外。日本对华夷秩序的游离态度，并不是由于它距中华“绝远”，而恰恰是因为它与中国“一衣带水”地接近，不是由于它的社会诸系统同中国差异极大，而恰恰是因为它相当充分地吸纳了中华文明，创造出一种几与中华文明同步的高水平的大和文明。由于地处岛国，日本成功地抵御了元朝帝国两次征伐；由于主动、创造性地吸纳了中华文明，日本在吸纳华夷秩序时不是被动地接受、承认自己“夷”的地位，而是主动地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将自己置换为“华”的地位，并尝试构筑“小中华体系”。^②

基于特定地缘政治建立起来的秩序形态，其辐射范围往往受制于地理和文化因素，这一点在日本与世界的关系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早在 1543 年，葡萄牙商船就让日本确知了欧洲的存在^③，但当时的日本对欧洲仅限于地理层面的模糊认知，还无法上升到对其秩序、制度、文明的清晰认知。日本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知之甚少，更无法预见这一地区秩序最终会演变发展为影响自身与世界的国际秩序。就国家间实力对比而言，据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估算，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即日本江户时代中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22.3%，日本占 4.1%。而当时所有西欧国家的生产总值加起来不过占世界的 22.5%，其中英国只占 2.9%。美国则仅占 0.1%。^④ 直至今时，处于闭关锁国中的日本基于内外形势与地缘政治的实用主义考量，虽对西方文明有一定认识，山添博史甚至认为“日本的国际秩序

① 杨伯江：《日本民主党对外战略方向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2 期，第 47 页。

②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6 期，第 36 页。

③ 日本学者北冈伸一认为，在历史上日本和西方曾有两次接触，第一次是在 16 世纪，第二次是在 19 世纪，初次接触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不过这种西方的影响尚在可控范围内。参见北冈伸一：《日本政治史：外交与权力》，王保田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 页。

④ 麦迪森：《世界千年经济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61 页。

观已初具西欧近代国际秩序观所谓的‘近代性’等诸特征”^①，但总体上仍未脱离华夷秩序体系。

（二）“脱亚入欧”：由东方转向西方

从18世纪开始，随着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相继发生，欧洲乃至世界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欧洲，法国大革命撼动了整个欧洲的封建秩序。为围剿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而形成的反法联盟取得了最后胜利，通过创立维也纳体系，欧洲均势得以重建，欧洲维持了长达几十年的和平。^② 在世界上，欧洲大国凭借其迅速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加紧殖民扩张，将包括亚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变成欧洲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东亚，伴随庞大的中华帝国的衰落，华夷秩序逐渐解体。处于该秩序边缘的岛国日本借机而起，在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新地区秩序还是加入欧洲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之间摇摆，最终选择了后者。

1840年鸦片战争中，中国惨败给西方列强，在日本统治阶层引发巨大震动，形成了两种对区域秩序截然不同的判断。一种是认为中华帝国虽然衰落，但华夷秩序应当维持，日本应积极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新华夷秩序”，为此既要在区域内重新“洗牌”，又要对外锁国攘夷。另一种是主张开国，学习西方文明，融入西方主导的近代国际秩序。前者以保守派幕府领导层为代表，后者以开明派官僚为代表，双方针锋相对，僵持不下。1853年和1854年，美国使节马修·佩里率领舰队两次闯入日本近海，以武力威逼日本开港通商，事实上打破了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来自西方的正面冲击，意味着日本与一种极其异质的文化体系的碰撞^③，促使日本“经历了一个由完全不关心到迫切的危机感，由充满恐惧和偏见的狂热‘攘夷论’到积极‘开国论’，对西方文明充满尊敬的巨大转变”^④。他们开始相对理性地接触、了解西方文明，并将其视为日本实现强国化所必需的课程。^⑤ 作为对时局异变的回应，佐久间象山上书幕府称：“清国之战败，盖因只盲目将对方视为夷狄，而无视其军事技

^① 山添博史认为日本国际秩序观的“近代性”表现为：日本已意识到通过对等的国家身份维护国家利益、处理国际事务的必要性，以及通过脱离宗教礼法治理模式、以普遍性规范来构筑地区秩序和维护有效统治的重要意义。参见：山添博史「江戸時代中期に胚胎した日本型『近代的』国際秩序観」、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国際政治』2004年11月号、26頁。

^②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7—88页。

^③ 佐藤誠三郎『「死の跳躍」を越えて—西洋の衝撃と日本—』、千倉書房、2009年、7頁。

^④ 同上书，第8页。

^⑤ 同上书，第28页。

术实力”^①，“贸然拒绝其通商请求，必遭战乱之祸。在我尚无胜算形势下，应积极扩充军备，发展西式海军”^②。同时，“要认清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西洋列强，了解对手，承认西洋文明的力量。日本要继承研究西洋的传统，制订完备计划和有的放矢地应对西欧列强对外扩张的世界趋势”^③。

在西方坚船利炮下开国的日本，面对东西方两种秩序的冲突，有些人已预见西方会取得胜利。如藩士桥本左内、幕府老中堀田正睦等开明派政治精英普遍认为，“东西方之间如战国乱世般的冲突，势必走向万国统一，最终结局不会是古代中国主导的东方秩序，而是西洋列强主导的西方秩序”。在这个意义上，“鸦片战争和佩里来航对东亚而言是一次来自‘西洋的冲击’，使东亚地区被强行卷入 19 世纪的国际秩序之中成为可能。”^④ 开国意味着日本将直面列强对峙的势力均衡原则和用国际法来约束主权国家的法律体系。如酒井哲哉所言，对于面临开国的日本而言，不可避免地需以所谓“平等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权力政治观念来代替华夷秩序下以道德统治为基础的政治观念。对沉浸在华夷秩序迷梦中的清代中国，他们认为中国人“尚未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上许多独立国家中的一个，他们的皇帝统治的‘天下’并不是天底下的所有地方，而只是地球表面的一部分，这在地图上标得清清楚楚”^⑤。

明治政府的建立，意味着开明派力量的最后胜利。这一时期，日本政治精英对西方秩序有了进一步认识：“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万国公法是为了统御诸国”，“兵力的强弱是决定是非曲直和胜败的唯一依据，诚如万国公法不过是强国便于恐吓弱国的口实而已”^⑥。同时，也认识到“倡导势力均衡关系的西方秩序，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强大军事实力，拥有先进技术和雄厚经济实力及高度文明化是不可或缺的”^⑦。国际社会（秩序）将由西方国家集团主导，唯有“脱亚入欧”、融入国际社会才是日本唯一可行的道路。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唯今之急务，在于应乎时势，开启锐眼，脱从前之弊

① 佐久間象山「時政に関する幕府宛上書稿」、『日本思想大系 55』、岩波書店、1971 年、313—316 頁。

② 佐久間象山「海防に関する藩主宛上書稿」、『日本思想大系 55』、岩波書店、1971 年、226 頁。

③ 吉田常吉・佐藤誠三郎編集『日本思想大系 56 幕末政治論集』、岩波書店、1976 年、137 頁。

④ 小野直樹『日本の対外行動』、ミネルヴァ書房、2011 年、29 頁。

⑤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03, No. 213, Oct. 1866, pp. 549–57.

⑥ 酒井哲哉『近代日本の国際秩序論』、岩波書店、2007 年、26 頁。

⑦ 佐藤誠三郎『「死の跳躍」を越えて—西洋の衝撃と日本—』、32—33 頁。

习”，“事态大变，诚不得已……大力充实兵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①崇尚西方文明和军事政治制度、追求实力主义和殖民扩张的观念，在日本精英阶层中蔓延开来。

以“明六社”“鹿鸣馆”为代表，日本掀起一场欧化风潮。福泽谕吉极力倡导日本学习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宣扬的“丛林法则”，与西洋文明共进退，告别和侵略亚细亚东方之“恶友”中国。^②他根据文明的发达程度，将世界文明分为最高文明国、半开化国家和野蛮国家三种类型，日本处于“半开化”的状态。福泽认为，所谓的文明指物与心两方面的进步，文明国不只在物质上，精神上也处于优越的地位，而野蛮国则被欧洲人逐渐殖民地化。为确保国家的独立，半开化国应当以实现文明化为第一要务。出于这样的紧迫感，福泽撰写《文明论概略》一书^③，并积极倡导“脱亚入欧”论。从1867年的《西洋事情》、1875年的《文明论概略》到1885年的《脱亚论》和1894年的《日清战争乃文明野蛮之战》，他从支持带有国族主义倾向、用于维新图强的“文明”，发展到支持欧洲型的文明（扩张）主义与帝国主义“文明”，进而形成日本化的军国主义“文明”。至此，“文明”演变为日本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④

基于上述考虑，明治政府确立了“脱亚入欧”的国策，其本质就是在发展自身实力的基础上，与西方列强为伍，征服和掠夺亚洲弱邻，以最终实现日本跻身世界强国的目标。^⑤通过维新改革，从器物文明乃至制度观念，日本全方位地走上了西化之路。

总之，如基辛格所言：“在亚洲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和文化实体当中，日本最早、最果断地对西方的进击做出了反应。”^⑥日本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实力上的巨大差异，欧美诸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必将波及东亚地区，而固守华夷秩序是极其困难的，其最终必然走向瓦解。因此，疏离华夷秩序、加入西方国

① 外務省調査部編『大日本外交文書（慶応三年十一月至明治元年六月）』、第1巻、第1冊、日本国際協会、1938—1940年、391—393頁、227—228頁。

② 福沢諭吉「脱亜論」、『福沢諭吉全集』（第10巻）、岩波書店、1960年、239—240頁。

③ 飯田敬輔など編「特集 主要国の国際秩序観と現代外交」、『レヴァイアサン』2016年4月号、木鐸社、14頁。

④ 刘文明：《欧洲“文明”观念向日本、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述评——以基佐、福泽谕吉和梁启超为中心》，《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73页。

⑤ 张勇：《秩序变革期日本外交的重构与对华政策调整》，《外交评论》2018年第6期，第97页。

⑥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260页。

际秩序是日本合理又现实的选择。^①这一时期，日本国际秩序观的转变就是在“东亚的地区性国际关系被卷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展开的”^②，其具体有两层含义：一是由亚洲国家变为西式强国，摆脱华夷秩序融入西方秩序体系。如井上馨所言，“我帝国及人民将如欧洲之邦国，如欧洲之人民也”。^③二是接受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德国铁血军政体制，并将其与日本固有的武士道、神道及尊皇思想杂糅，汇成其新秩序观的理论支撑，在对外行动上表现为崇尚实力主义、唯力量主义、霸道至上，对外实施侵略扩张等，以图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中成为像欧美一样的强国。^④

（三）主导国际秩序：从追随到挑战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美以及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一时期，全球国际关系体系仍以欧洲为中心。而在欧洲内部，出现了英法俄协约国与德奥同盟国两极对峙格局，随着矛盾的冲突和激化，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之际，日本认为：“这次欧洲之大乱，对日本国运之发展，乃大正新时代之天佑”，“倘若失掉这个机会，将永远成为世界的落伍者”。^⑤其抓住契机，与英国结成联盟，向同盟国宣战，趁机扩大自身在亚洲的势力。作为战胜国，日本在一战后的国际体系中发言权进一步提升。1919 年 1—6 月，27 个战胜国的代表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讨论战后世界新秩序。出席会议的各国地位是不平等的，美、英、法、意、日五国享有“整体利益”，各拥有五名代表，有权出席一切会议；中立国与即将成立的新国家没有席位，它们必须收到上述五国之一的邀请才能出席有关会议。

在巴黎和会上与会国家签署了一系列条约，最为重要的是《凡尔赛和约》，其主要内容是建立国际联盟（简称“国联”），其制度理念是主张建立大国协调机制、实行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所谓集体安全，是与孤立主义和中立主义完全对立的核心理念，其基本原则是要求综合运用和平手段，威慑潜在侵略者，以集体方式保障各国安全，对国际上的侵略行径予以法律制裁和道义谴责。这种制度理念成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理论基础。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政治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为提高自身对国际

① 小野直樹『日本の対外行動』、35 頁。

② 同上书，第 11 頁。

③ 入江昭『日本の外交』、中公新書、2013 年、22 頁。

④ 同上书，第 28 頁。

⑤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三册），姜晚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136 頁。

秩序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于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召开华盛顿会议，就远东国际秩序、海军军备等问题展开磋商。以在该会议上缔结的各项条约、决议为框架的国际关系体系，史称“华盛顿体系”。这一体系有三大特质：其一，以实现多国协调为指向，以多国间的条约网为基本框架。其二是以军控条约为基础组织框架。一战以前的国际关系由日英同盟这种双边军事同盟条约或者与之相当的规则组织起来，而在华盛顿体系中，国际关系被非军事化——不是通过军事同盟，而是通过军控条约组织起来的。其三，它是由当事国间的经济、金融上的相互协作来支撑的。^①美、英、法、意、日、比、葡、荷、中九国参加华盛顿会议，达成的《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简称《五国公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强的主力舰总吨位比例为5:5:3:1.75:1.75。虽然日本对这一比例并不满意，但其足以证明日本已跻身世界海洋强国之列，实力和国际地位得到列强承认，可真正以“强者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和战后国际秩序构建。

在日本国内，1920年爆发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七年后又爆发金融危机，社会动荡不安。为转嫁矛盾、摆脱危机，日本帝国主义急于武装侵略中国进而征服亚洲大陆。1927年6月，上台执政不久的田中义一主导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1929年开始并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对日本也造成严重打击，使之陷入经济、政治和社会三重危机交织状况中。在这种背景下，军国主义势力借势推动日本政府制定《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确定了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方针。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制造“九一八事变”，公然使用武力破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对此，国联于1932年1月21日成立李顿调查团，着手调研中日关系问题。10月1日国联发表调查团报告书《中日纷争调查委员会报告书》，指出日本以强力侵吞并占领了确属于中国的领土。对此，日本认为，“一直以来，西欧国家体系中所遵循的作为国际政治基准的均势原理的自明性已然丧失”，意在打压日本。^②为表示抗议，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而后再单独废弃了《五国公约》《伦敦海军条约》，这标

^① 三谷太一郎认为，华盛顿体系虽然存在各种导致其受挫的弱点，但基于军控条约下的和平以及现实中的多国间秩序，对于朝着无秩序、无理念方向漂流的当今世界和日本来说，还是值得作为历史教训加以吸取的。至少，“把华盛顿体系的重要遗产保留在宪法第九条中的日本，应该考虑一下它的意义”。相关内容参见三谷太一郎：《日本的“近代”是什么：问题史的考察》，曹永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74—280页。

^② 酒井哲哉『近代日本の国際秩序論』、23頁。

志着日本放弃通过融入国际秩序实现与西欧列强并驾齐驱、巩固亚洲强国地位和谋求帝国利益的“国际路线”。在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共同目标下，日本与德国、意大利联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 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用实际行动动摇了国联所确立的普遍的国际秩序观”^①。

1940 年 7 月，日本近卫文麿内阁通过《基本国策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即以日本为中心，包括中国、朝鲜、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西南太平洋岛屿在内的殖民帝国。“在秩序观上否定了国际秩序中通行的条约和国家所享有的独立主权原则，凌驾其上的是拥有主导权的日本在地区秩序中的优先地位。”^② 日本由西方秩序的追随者转变为秩序的挑战者，这一角色易位的历史进程深刻表明，“一个均势的国际秩序至少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国家实力强大到足以称霸的水平，二是从前的二流国家欲跻身列强行列，从而导致其他大国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直到达成新的平衡或爆发一场全面战争”^③。

日本所构建的“大东亚秩序观”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为给侵略找到冠冕堂皇的“理论支柱”，利用了“东洋对西洋”的“抵抗逻辑”。其实，“联亚拒欧”“共存共荣”只是迷惑亚洲国家、掩饰其与欧美霸权体系相对抗、争夺世界霸权的美丽辞藻而已。第二，以日本为中心的“新华夷秩序观”，在日本文化深层并没有彻底消失。“其欲将中国中心时代虚实参半的‘封贡体系’朝实体化方向推进的系列行动，还让欧美国家发现，它们亟欲解构的前近代区域关系体系正在被日本所重建，而且是霸占式的新建。”第三，日本在国际秩序观上的转换是实用主义的。在实力不甚强大时，日本依附利用强者，为在现代国际秩序中立足，与秩序中最强者进行战略合作，依托强者参与秩序。当其实力强大时，传统国际秩序与现代国际秩序会发生位移，日本转而以传统国际秩序为工具与欧美列强进行各种周旋，而“一旦手段奏效，便又会回到原来的老路，并为加速实现其既定目标而全力以赴”^④。然而，伴随着亚洲国家的觉醒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壮大，玩弄东西两大国际关系规则的日本军国主义，最终受到来自亚洲和欧美的双向挤压而走向覆灭。

① 酒井哲哉『近代日本の国際秩序論』、24 頁。

② 同上书，第 48—49 頁。

③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 49 頁。

④ 韩东育：《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1592—1945）》，《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4 期，第 201—203 頁。

二、日本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认知

二战结束前后，盟国通过一系列国际会议和国际协议确立了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即“雅尔塔体系”，这一体系主要是以战时“三巨头”美、苏、英作为主要博弈者根据其实力重新分配利益的产物。战后国际秩序在本源设计上基本延续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理念，以联合国为中心，以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发展友好合作为宗旨，以尊重国家主权平等、维护人类基本权利为原则，包括大国协商、集体安全、制度管理等核心要素，体现了“普遍主义规范与大国主导”“自由主义理念与现实主义权力要素”的结合。^①但在现实演变中，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斗争日益激烈，两极对抗竞争的冷战格局成为战后国际关系最为突出的特征，国际秩序的“应然”与“实然”出现巨大裂痕，原初设定的诸多原则在实践中被架空或破坏。在深刻复杂的国际变局下，身处美国、中国、苏联、亚洲、欧洲等各方力量以及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并立的国际社会，如何确立有利且现实可行的生存发展战略，如何编排日美同盟与国际合作的关系，是日本认知国际秩序、处理与之关系的核心问题。

（一）战后日本国际秩序选择

在雅尔塔体系下，盟国确定了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战败国的基本政策，对其进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根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防止它们东山再起。但是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这一“应然”的国际秩序难以有效实现，进而导致了现实秩序与法理秩序的对立和冲突。美苏凭借自身实力与影响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阵营，国际体系逐步发展成为两大阵营之间相对抗的冷战格局，美苏都在谋求扩张自身的势力范围。^②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多数时候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以其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并未真正建立。

日本与战后国际秩序的关系，尤其体现出上述的“偏差”与“错位”。二战甫一终结，冷战旋即开启，形成了两种秩序叠加规制、抵冲影响日本的复杂状况。在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中

^① 相关内容参见：中西寛「戦後秩序の動揺と日本外交の課題」、『国際問題』2018年1月号。

^② 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1957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57/s32-contents.htm> [2020-04-20]。

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对日政策发生逆转，不再要求日本中立化，而是要将其改造成在远东遏制苏中的桥头堡。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加速了美国对日媾和进程。面对两种秩序交错角力的形势，以吉田茂为代表的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基于对国际格局发展变化的洞察，^① 选择了一条追随美国、在美国主导下实现国家重建和复兴的道路。吉田茂认为，对仍处于战败国地位的日本而言，国家目标无疑是恢复主权和战后复兴，如果此时日本开始真正的再军备，将阻碍国家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考虑到冷战大背景，独立后的日本采取中立主义也不具现实性，不利于国家发展。基于对日本实力、所处国际环境、可望实现的国家目标及实现目标的适当手段等因素的综合分析，吉田确定了对美交涉方针：明确表示希望“入圈”，^② 但坚决抵抗美国对日的再军备要求，同时与美国缔结《日美安全条约》^③，“授权”美军驻扎在日本境内^④，在经济复兴上寻求美国的帮助。

1951 年早春，日本外务省政务局政务课课长斋藤镇男奉吉田茂之命启动“战时外交反省”这一绝密课题。据已解密外交档案^⑤ 显示，该课题主旨是调研日本外交失败的原因，以供后世镜鉴。经过集中调研，课题组在提交的系列报告中详尽总结了日本外交的深层问题及教训。在考察二战前重大对外决策过程的基础上，课题组归纳了日本在战前对国联、对美欧、对华、对俄、对德意以及东南亚外交中的失误，明确指出战前日本外交的最大问题是“理念的缺失”。在错误国策指引下，日本外交深受“二元外交”困扰，促使其加速滑向殖民中国大陆以及与超级强国美国为敌的深渊，最终招致了日本的覆亡。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军部独大局面，尽管日本外务省存在不满，甚至还有一定程度抵制，但未能采取足够有力的措施遏制其独断专行。除政军关系失衡之外，报告中还强调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却固执地选择对外扩张甚至与海洋强国美国为敌，也是一个重大错误。文件的结论部分指出，

① 关于吉田茂的世界观及国际形势认识，可参见：吉田茂「日本外交の歩んできた道」、北岡伸一編『戦後日本外交論集』、中央公論新社、1995 年、99—103 頁。

② ジョングワー『吉田茂とその時代』（下）、TBSブリタニカ、1981 年、257 頁。

③ Mike M. Mochizuki, “Japan’s Search for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8, No. 3, Winter 1983/1984.

④ 原文为：“在和平条约及本条约（指《日美安全条约》——作者注）生效的同时，日本国授权美国将其陆、海、空军配备在日本国内及其附近，美利坚合众国予以接受。”

⑤ 2003 年 4 月，日本外务省公布了这批约 10 万字的档案，经原驻法大使小仓和夫整理后于 2010 年公开出版。相关内容参见：小倉和夫『吉田茂の自問—敗戦、そして報告書「日本外交の過誤」—』、藤原書店、2010 年。

一切都要以根为本，若在根本问题上存在错误，末节的苦心只不过是聊以自慰而已。日本自以为是的“大东亚共荣圈”理念有违世界发展趋势，不为国际社会所容，其鲁莽发动没有胜算的战争，结果遭到惨败。

1951年9月，日本与美欧等片面媾和，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约》。旧金山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秩序在东亚、亚太的实然存在，不仅改变了日本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更固化了东亚地区的冷战结构。日本通过《旧金山对日和约》重返国际社会，凭借《日美安全条约》获得美国的安全承诺，积极主动地融入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体系。在当时极不平等的日美关系下，日本主要通过美国与国际秩序相关联。日本在“吉田路线”下走上了一条“重经济、轻军备”的道路，而该路线的前提是对美“一边倒”。由此，日本成为美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自由国际秩序”的积极追随者。鉴于当时国际形势与日美关系，日本制定的国家战略是在日美同盟之下寻求生存与复兴。“吉田路线”在政治与法治层面表现为“安保、九条”双轴体制^①，在政策层面以“轻军备、经济中心、日美安保”^②为核心内容，反映和折射出的正是“自由国际秩序”与苏联主导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世界秩序”并存与竞争的历史现实。

1952年日本恢复独立后，“吉田路线”被不断制度化。在日本政策研究领域，最早系统关注“吉田路线”的代表人物是日本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集大成者高坂正尧。高坂的国家战略设想与“吉田路线”暗相契合。他认为，日本可限制军事力量，遵循适度的防卫政策。日本的强大不是体现在一个宏大的计划，而在于使小计划的集合变成可能的无限的适应力，以及能够生成冒险精神的活力。从这些意义上说，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应发挥“通商国家”这一巨大的优势。而且，发掘海洋国家这种伟大的能力，靠的是能够把冒险和慎重、非英雄主义和英雄主义结合起来的政治技巧，以及需要慎重但同时又不以慎重为结局的广阔视野。高坂把它称为“地平线”，称“那里有日本的未来”。^③ 在另一位现实主义学者永井阳之助看来，日本应注重自身实际

^① 参见添谷芳秀：《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李成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添谷芳秀『秩序変動と日本外交—拡大と収縮の七十年—』、慶応義塾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② 参见：Mike M. Mochizuki, “Japan’s Search for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8, No. 3, Winter 1983/1984; Kenneth B. Pye, “In Pursuit of a Grand Design: Nakasone Betwixt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 13, No. 2, Summer 1987.

^③ 高坂正尧『高坂正尧著作集』（第1卷）、都市出版、1998年、179頁。

利益，对内应加强务实的战略设计，对军费开支加以限制；对外最重要的是确保获得美国的安全保证。^① 高坂与永井亦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为满足美国要求，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做出更大的“同盟内贡献”，但这务必要保持在“最低必要”限度内。

依循二战末期设计的国际秩序图景，战后日本需要处理与联合国、与国际秩序主导国家、与所在地区国家等三重关系以及三重关系彼此之间的平衡，但在现实的国际形势变动中，日本或被动或主动地做出抉择，选择以日美关系为重，将日美同盟作为立身之本，^② 对三重关系的处理出现了明显的偏重。1957 年 9 月，日本外务省发布第一份外交蓝皮书《我国外交近况》，提出了“外交三原则”，即“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诸国协调”“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在此基础上，日本外务省又确立了外交的三大课题，即“与亚洲诸国的善邻友好”“经济外交”“调整对美关系”。^③ 日本试图通过提出“外交三原则”改善日本在两大世界秩序间的失衡状态以及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但其理念与现实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外交三原则”此后也并未能全面指导日本外交实践，日本外交逐渐沦为“一原则”，即彻底的亲美路线。

战后日本遵循了“三阶段”发展的目标与模式，即追求独立、安全、领土完整的初级目标阶段。在实现初级目标后，日本追求扩大市场、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保护条约权利、确保战略要地的中级目标阶段，以及在实现初、中级目标后，基于国家或民族固有的世界观或视野，在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中寻求确立自己“存在理由”的高级目标阶段。^④ 日本虽然遭遇了战败，但由于占领时期与美国确立的特殊关系，在战后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恢复主权、回归国际社会和战后复兴；另一方面，日本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是以牺牲一定主权独立和领土权益为代价的，同时，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也成为日本未能与深受其殖民侵略的亚洲邻国实现和解的重要外部因素。加上根深蒂固的以日本为中心的“新华夷秩序观”和福泽谕吉式“文明国家”优越意识，无论是宏观上处理与国际社会的三重关系，还是设定具体外交目标发展的三个阶段，尤其在初级目标和高级目标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和难以调和的矛

① 相关内容参见：永井陽之助『現代と戦略』、文芸春秋、1985 年。

② 北岡伸一「日本外交の座標軸—外交三原則再考—」、『外交』2011 年 6 月号。

③ 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1957 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57/s32-contents.htm> [2020-04-20]。

④ 馬場伸也『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国際政治学』、東京大学出版会、1980 年、209 頁。

盾。从战败、被占领到恢复主权直至当今，日本仍然感受“同盟”与“自立”的两难，迟迟难以确定在地区中合适的国家身份。不过，随着日本国力的发展，以及同盟中“被抛弃”“被卷入”的危机意识，日本似乎越来越追求将自己打造成不同秩序之间的游走者，巧妙利用各种力量博弈，享受不同秩序的利益，努力在不同阶段追求实现最适合自身发展的国家战略。

（二）日本眼中的战后秩序及其两次震荡

日本对国际秩序的认知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基于自身利益、实力与理念，对国际秩序发展态势、本国在秩序中的地位及未来机遇挑战等的思考认识。日本对国际秩序的认知深受国内和国际双重因素影响，在“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互动基础之上被不断塑造。二战后美国主导下形成的国际秩序，在日本看来是建立在国际法和自由价值基础之上的“自由国际秩序”，主权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①其基础是基于各大国力量对比构建起来的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国际机制和规范。

历史地看，“自由国际秩序”有1.0、2.0、3.0等版本。其中，1.0版本借助威尔逊主义而产生。威尔逊主义起源于民族国家涌现、民族主义兴起的年代，主张国家主权和民族自治原则，但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复杂国际环境下，该秩序并未真正建立。2.0版本大体上是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20世纪40年代，罗斯福像威尔逊一样，希望建立在大国合作与强制下实现和平的国际秩序。而后，美国通过重建欧洲、对战败的德国和日本实行改造，使之承诺开放市场、遏制苏联，奠定了该秩序的基础。在冷战的催化下，美国霸权下的自由国际秩序逻辑最终宣告形成。^②3.0版本即后霸权式“自由国际

^① JIIA, “Strategic Annual Report 2019: Is It Possible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Order Based on Free, Fair and Transparent Rules?”, http://www2.jiia.or.jp/en/pdf/strategic_annual_report/JIIA_strategic_annual_report2019_en.pdf[2020-04-20].

^② 2018年日本智库PHP研究所出版了题为“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与再生”的政策报告。该报告援引伊肯伯里的理论提出，从权力行使来看，国际秩序可分为均势秩序、霸权秩序与宪政秩序三类。其中，宪政秩序是指基于国际协调确立的国际秩序，可细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霸权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而霸权国具有较强的自我约束性；二是没有单一的霸权国能够主导，而是基于国际协调形成的国际秩序，其中小国可通过协调向大国提出要求；三是超国家立宪秩序，比如欧盟。报告认为冷战时期的“自由国际秩序”为宪政秩序，美国居于霸权国地位，但美国的自我约束性较强，对盟国比较慷慨宽容。这一秩序在冷战期间涵盖所有西方国家，冷战结束后规模有所扩大。参见：PHP「新世界秩序」研究会『自由主義の国際秩序の危機と再生—秩序再編期の羅針盤を求めて提言報告書—』、2018年、11頁、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81025_01.pdf[2020-04-20]。

秩序”，目前只是部分地出现，其完整的面貌和逻辑还处于远不确定的状态。^①“自由国际秩序”确立至今，随着国际形势特别是大国力量对比及相互关系的不断调整演化，产生了两次大的震荡。

1. “自由国际秩序”的第一次震荡——20 世纪 70 年代

20 世纪 70 年代，主要国家力量对比有所变化，伴随着中美和解及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国际格局面临调整。在资本主义世界，日本和西欧崛起，在经济方面对美国形成一定挑战，出现三足鼎立局面。这些变化意味着美国霸权相对衰落，运行 20 多年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金本位体系崩溃。为了对抗苏联，美国希望其盟国特别是大国发挥更大作用，在中东石油危机的背景下，七国集团（G7）成立。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力量兴起，东亚经济开始起步并快速发展。

这一时期，日本围绕国际秩序的主要课题是如何处理成为经济大国后与美国及国际体系中各方的关系。美国作为冷战格局中的西方盟主，虽然在美苏争霸的不同阶段相应地调整自身外交政策，但目标始终不变，即保证其综合安全、维护总体战略优势。在美日关系层面，占领时期缔造的美日安保体制建立在战胜国对战败国的绝对权力关系基础之上，因此本源性地具有美主日从、美大日小的性质。日本的安全内包于同时也从属于美国的安全，这种结构关系是根深蒂固、难以撼动的。在日美安保体制广义化、扩大化的过程中，^② 伴随经济崛起，日本不时浮现大国冲动，美国则通过订立新规，如要求日本“无核化”、要求日本增加贡献和分担责任等方式对其加以控制、牵制。这一时期日本的自我定位开始呈现出一体三面的特征，即作为“美国的合作伙伴”、“自由阵营的一极”与“国际国家”。

在中美关系缓和的背景下，加之 1972 年美国“越顶外交”对日本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日本对日美安保的认知逐渐发生变化，萌生出对日美同盟脆弱性的危机意识，由此前“避免被卷入”变为“避免被抛弃”。美国顺势抓住日本既想独立又怕被抛弃的心理，采取扩大与日对话、启动重新布局基地的策略，以求达到争取日本财政支援、对日本防卫计划的制定施加影响、增强自卫队辅助美军功能等目的。而对日本来说，积极推进对美的实质性安保

^① 冯绍雷：《“自由国际秩序”、多极化与俄罗斯的“2024 议程”》，《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6、7 页。

^② 参见：原彬久「日米安保体制と冷戦」、『国際政治』第 100 号、1992 年；「序説 日米安保体制—持続と変容—」、『国際政治』第 115 号、1997 年。

合作，实际是要借助美国强化自身防卫力量建设。

这一时期，日本对国际秩序的思考与应对开始呈现“溢出”日美同盟框架的趋势。日本参加七国集团，既意味着必须不断为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秩序做贡献，也标志着其跻身于西方经济政策协调参与者的行列。^①同时，在地区形势进一步缓和的背景下，日本开始积极摸索地区合作。1977年日本时任首相福田赳夫访问东南亚，发表新东南亚政策，表明日本不做军事大国，以对等者的立场致力于改善同各国之间的关系，努力促进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此后的大平正芳内阁着手进行“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研究，并与澳大利亚合作，客观上为日后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亚太经合组织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2. “自由国际秩序”的第二次震荡——20世纪90年代前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两极格局不复存在，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此背景下，美国通过信息技术革命加快主导全球化进程，并在全球大力推广自由市场经济理念。最具代表性的是，在美欧日协调基础之上，历时八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基本达成一致，推动关贸总协定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伴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而出现气候、非传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后，美国开始主导全球治理议题。同时，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开始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自由国际秩序”的范围不断扩大。冷战结束前后也是日本历史上最为繁荣、对世界经济影响力最强的时期，日本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80年代初的10%上升到80年代末的15%。^②“美国衰退”“日本第一”的论调喧嚣一时，日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急剧膨胀。日本不满足于在国际秩序中只扮演经济大国角色，希望参与政治、安全领域的协调，增加国际责任，谋求成为世界秩序中的一极。客观上，随着冷战结束，以战略对立为主题的美苏两极体制成为过去，世界整体安全形势缓和，国家之间的竞争表现为综合国力的较量，经济因素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因素，经济指标在衡量国家相对地位时的重要性上升，这使得以经济技术见长的日本处于国际竞争中的有利位置。1990年，日本外

^① PHP「新世界秩序」研究会『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の危機と再生—秩序再編期の羅針盤を求めて提言報告書—』、2018年、11頁、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81025_01.pdf[2020-04-20]。

^② 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05》，吴万虹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79页。

务省事务次官栗山尚一在《变动的 90 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展开》一文中提出日美欧构建“三极体制”^①，时任首相海部俊树也在国内外多次宣称“以美日欧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日本所谓的新秩序，不仅指经济领域，也涵盖政治和安全领域。就此，1991 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明确指出：“如今的日本正处于能够对与构建国际新秩序相关的所有方面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位置。”日本在解决地区冲突、促进军控与裁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问题上的积极参与也表明，其已经实质性影响到所有与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相关的问题。^②经历海湾战争的考验后，日本于 1992 年通过了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实现自卫队海外派遣为目的的《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简称“PKO 法案”）。1993 年，小泽一郎在其撰写的《日本改造计划》中明确提出，日本应在国际安全领域做出贡献。^③

冷战后国际政治的急剧变化对美国对日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开始转变冷战时期为对抗苏联而实施的的对日庇护政策。美国宣称建设“世界新秩序”，调整后的美国全球军事战略更加重视海外军事存在的作用，更加重视经济与安保的相关性。1995 年美国发表《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美国在亚洲拥有一以贯之的利益，不允许该地区出现任何霸权国或霸权联合，美国军事存在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及美国经济利益的核心要素，当然美国战略的顺利实施需要日本的支援、理解与合作。^④在此背景下，日美同盟在经历短暂的“漂流”期后，以 1996 年 4 月日美联合发表《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为标志而得以强化。日本确立了继续追随美国、强化日美同盟、保护本国安全与利益的方针。

（三）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对国际秩序面临挑战的认知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国际权力对比急剧变化，日本非常敏感地意识到这一变化，认为这对当今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了三方面挑战。

1. 主权国家内部问题凸显，特别是美西方国家政治不稳、社会撕裂，从

① 栗山尚一「激動の90年代と日本外交の新展開—新しい国際秩序構築への積極的貢献のために—」、『外交フォーラム』1990年5月号。

② 杨伯江：《战后 70 年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日本学刊》2015 年第 5 期，第 19—20 页。

③ 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冯正虎、王少普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年，第 66—67 页。

④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for the East Asia - Pacific Region*, Feb. 27, 1995.

内部冲击着“自由国际秩序”

伴随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推进，“风险社会”出现。与此同时，被冷战掩盖的新风险也开始出现。^① 冷战结束后，主权国家的裁量权进一步被削减。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在全球大行其道，“全球化问题”出现，导致很多国家的社会内部出现问题。2008年之后，这些问题更加凸显，并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

在全球化进程中，很多国家无疑是被裹挟进去的，被动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半边缘区尤其是边缘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不平等的地位。^② 日本认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蓄积的矛盾对“自由国际秩序”形成挑战，以逆喷发的形式投射向世界体系的中心。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脱离殖民统治实现独立后被纳入主权国家体制，由于工业化失败、累积债务增加等原因，它们缺乏从世界体系边缘脱离出来的契机。虽然其内部也出现了民主化动向，比如冷战结束前后亚洲等地的民主化浪潮和2010年以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等，但此后民主化停滞甚至与民主化逆向而行的倾向明显。可以说，冷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愿景在发展中国家远未实现。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脆弱国家”，内战升级，人道危机频繁，对主权国家体制构成威胁，国家外交能力也受到影响。^③ 与此同时，所谓“流氓国家”也给“自由国际秩序”带来更直接的威胁。^④

全球化进程中，美西方国家在某些方面应对不当，特别是在国内层面，结果引发民粹主义、反全球化、保守主义力量兴起。这种趋势在冷战结束后开始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进一步明显。很多日本学者认识到这一问题，他们认为这些力量在美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并影响到这些国

① Hiroshi Nakanishi, “Turbulence in the Post-war Order and Issues in Japanese Diplomacy”, *Japan Review*, Vol. 2, No. 4, Spring 2019, p. 24.

② 杨光斌：《世界政治的研究范式——世界政治的层次性与研究单元的多样性》，《世界政治研究》2020年第1辑，第17页。

③ PHP「新世界秩序」研究会『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の危機と再生—秩序再編期の羅針盤を求めて提言報告書—』、2018年、46頁、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81025_01.pdf[2020-04-20]。“脆弱国家”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保留主权国家的形式，但实际上政府无法实施有效统治。根据2018年“脆弱国家指数”（Fragile State Index），南苏丹、索马里、也门、叙利亚、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等被列为“脆弱度高的国家”。

④ PHP「新世界秩序」研究会『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の危機と再生—秩序再編期の羅針盤を求めて提言報告書—』、2018年、11頁、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81025_01.pdf[2020-04-20]。

家内部的稳定，特别是美国作为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其内部不稳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影响力下降成为国际秩序面临的巨大挑战。2016 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此后两国外交政策都发生明显转变。^①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强调“美国第一”，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连续退出各种国际机制，严重影响了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日本对美国缺乏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的意愿和责任感到非常不安，因其自身长期受惠于现行国际秩序，故不断强调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并表示日本等其他国家有责任维护当下的国际秩序、与挑战者进行竞争、分担美国的负担。北冈伸一指出，特朗普总统对国际合作漠不关心，如果七国集团分裂则无法战胜中国。他强调，民主国家应该努力增强国力，建立国际协调机制。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下日本应该发挥的作用，北冈强调：“日本应该与自由民主主义国家和地区联合起来，强化与发展中国家在健康领域的合作。”^②

2. 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权力持续向东方转移

新兴国家乘着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东风不断崛起，引起国际权力转移。国际力量的变化使发达国家的压倒性优势逐渐瓦解，导致“自由国际秩序”动摇。^③ 2008 年后，国际权力向新兴国家转移趋势愈加明显，日本官方智库观点认为，新兴国家中中俄两国对现行国际秩序不满，一直试图通过单边改变或是拒绝接受现行国际规范和体系，创建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环境。^④ 鉴于中国的影响力以及发展势头，中国被日方视为“自由国际秩序”最大的外部挑战者。

日本以警惕心态看待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视中国为“打破现状的威权国家”，不仅认为中国在实力方面挑战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而且在观念、国际规范和国家治理模式方面也挑战了美西方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日本各界十分关注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增长所带来的对外政策和方针上的转变，认为中国全方位的崛起从外部打破了现行国际秩序的权力平衡，中

① Hiroshi Nakanishi, “Turbulence in the Post-war Order and Issues in Japanese Diplomacy”, *Japan Review*, Vol. 2, No. 4, Spring 2019, pp. 26-7.

② 「『変わる世界 新型コロナ』〈中の1〉米中の対立 先鋭化」、『読売新聞』2020 年 5 月 9 日。

③ 金子将史「『新しい現実』と志あるリアリズム」、<https://shuchi.php.co.jp/voice/detail/6393> [2020-04-20]。

④ JIIA, “Strategic Annual Report 2019: Is It Possible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Order Based on Free, Fair and Transparent Rules?”, http://www2.jiia.or.jp/en/pdf/strategic_annual_report/JIIA_strategic_annual_report2019_en.pdf [2020-04-20]。

国“改写”国际秩序的方式和影响值得关注。如何与崛起的中国相处，特别是如何应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成立，成为日本高度关切的问题。日本认为，中国冲击了“自由国际秩序”，提升了作为大国的自我认知，在全球的存在感正在提升，向着“超级大国”的目标迈进。日本认识到自身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而且日本经济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坚持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中国与日本有相当多的共同利益。鉴于此，日本认为应当“塑造”和“规范”中国的崛起进程，用日本擅长的制度安排和议题设置等方式对中国采取规则制衡，最终“社会化”中国。

3. 中美博弈成为决定国际秩序走向的核心问题

中美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剧，双方有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走向事关国际秩序调整全局。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发布的《战略报告 2019》认为，美国各界已逐渐放弃中国可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乐观想法。特朗普上台后，其政策调整为正面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①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包括军事安全、经贸等传统领域的争夺，目前更突出体现在尖端技术领域。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尖端监视技术等不仅可能改变军事方面的游戏规则，这些技术本身也可能被当作外交工具使用。“后疫情”时代，中美在尖端技术领域的主导权之争将进一步加剧，远远超出经济领域，这将加深两国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对立以及由于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不同而带来的深层次对立。

为了应对中美关系及国际秩序的变化，日本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前提下不得不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PHP 研究所预测，21 世纪前 50 年，国际政治将围绕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协调展开，今后的国际秩序很可能是美国与中国各自主导的秩序相互渗透、同时存在，形成“竞争性相互渗透型秩序”，即两种国际秩序在激烈竞争中摸索合作，维持“不愉快的共存”（awkward coexistence）。因此，日本应该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分别对美对华展开对冲。^②

^① JIIA, “Strategic Annual Report 2019: Is It Possible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Order Based on Free, Fair and Transparent Rules?”, http://www2.jiia.or.jp/en/pdf/strategic_annual_report/JIIA_strategic_annual_report2019_en.pdf [2020-04-20].

^② PHP「新世界秩序」研究会『自由主義的国際秩序の危機と再生—秩序再編期の羅針盤を求めて提言報告書—』、2018 年、11 頁、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81025_01.pdf [2020-04-20].

由上可见，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一直致力于追求经济上繁荣与政治上独立，而且两者相互借重。战后初期，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日本以牺牲政治上的独立换取了以最快的速度实现经济上的繁荣。当经济实力达到一定水平后，日本又开始谋划将其影响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在此期间，日本对国际秩序的认知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日本一直谋求在国际体制内发展。它积极重返国际社会并加入联合国，将日美同盟当作其认知国际秩序的基本视角，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实现其国家战略。第二，审时度势，谋求战略自主性。日本坚守日美同盟，但又不被其束缚，试图在国际形势允许的限度内超越同盟，开展战略性外交，积极对国际秩序施加影响，谋求在秩序中的有利地位。第三，积极将自身的经济影响外溢到政治安全领域。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试图将其影响外溢到更广泛领域，充当战略平衡手，谋求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由秩序的追随者和受益者向引领者转变。第四，日本在国际秩序变革方面，始终持保守态度，主张对国际秩序进行渐进式改良。

三、大变局下日本对国际秩序变革的应对

大变局下，日本认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日本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存在“纵”“横”两个坐标。“纵”是基于历史维度，“横”则是“点”“线”“面”三者结合。其中，国家是“点”，日本对美、对华等双边关系是“线”，而“面”则超越国家和双边关系，是对国际秩序变动轨迹与趋势的“巨视”和战略把握。从“点”与“线”来看，国际秩序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来自中国与美国，两者中一个是日本最大邻国，一个是唯一签约盟国。^①从“面”上看，根植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国际秩序在经过冷战结束之初的扩张期后，因发达国家内部危机频现和新兴国家的挑战而处于守势，^②加之地缘政治回归，军事竞争加剧而出现动摇。

（一）日本明确界定新时期国家利益与战略目标

国家利益是确立国家战略的前提，也是决定日本国际秩序认知及采取相

① 細谷雄一『国際秩序—18世紀ヨーロッパから21世紀アジアへ—』、中央公論新社、2013年。

② PHP「新世界秩序」研究会『自由主義的国際秩序の危機と再生—秩序再編期の羅針盤を求めて提言報告書—』、2018年、11頁、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81025_01.pdf [2020-04-20]。

应外交政策的基础。20 世纪 60 年代，入江昭曾提出国家利益至少应包含三方面内容，即军事（国防）、经济（贸易、投资）、思想（道德的考虑、国家威信与地位等）。^① 2011 年，兼原信克将日本国家利益概括为：（1）保障安全，即确保生存与安全，维持和平，确保安定；（2）繁荣经济，不仅确保经济发展，还包括坚持以此为前提的自由贸易体制，海上交通线的安全，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3）维持和传播基本的伦理观、价值观，其核心是现代日本的自由与民主主义。^② 2013 年 12 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出台了战后日本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对新时期的国家利益予以系统阐述，并基于此阐释了日本有关国际秩序的主张：“首先，维护国家本身的主权与独立、领土完整，确保我国国民生命、身体、财产安全，继承丰富的文化与传统，维护以自由和民主主义为基本原则的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保证生存。同时，发展经济以实现我国的进一步繁荣，巩固我国的和平与安全。为此，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必须加强通过自由的贸易与竞争实现经济发展的自由贸易体制，尤其要在亚太地区，实现高度稳定、高度透明、可预测未来的国际环境。此外，维系和拥护基于自由、民主主义、尊重基本人权及法治等普遍价值观或原则的国际秩序。”^③

基于此，日本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战略目标：维护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保证国家之生存，加强必要的遏制力，防止国家遭到直接威胁；一旦遭到威胁，必须排除威胁，并将受害控制在最低程度；加强日美同盟，增进与地区内外的合作伙伴间的信赖及合作关系，推进具体的安全合作，从而改善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防止国家受到直接威胁，或降低威胁；在国际秩序的重塑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强化和维持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推进制定公正、开放的贸易、投资规则，形成把劳动者权利和环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均囊括在内的 21 世纪型新经济秩序。通过不断的外交努力和进一步的人力贡献，巩固基于普遍价值观或原则的国际秩序，在解决纷争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改善全球安全环境，构建和平、稳定而繁荣的国际社会。^④

① 入江昭『日本の外交—明治維新から現代まで—』、中央公論新社、1966 年、169—170 頁。

② 兼原信克『戦略外交原論』、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1 年、348—349 頁。

③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2013 年 12 月 17 日、<http://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html> [2020 - 12 - 05]。

④ 参见：「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2013 年 12 月 17 日、<http://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html> [2020 - 12 - 05]；山野内勘二「メガFTA—自由で公正な貿易・投資を世界へ—」、『外交』2018 年 7・8 月号、60 頁。

为达成上述战略目标，日本力争围绕国际秩序变革做出以下努力：一是在秩序调整方式上，希望积极影响国际秩序以和平渐进方式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转变。日本主流观点认为，如果国际局势沿当前现状直线型发展下去，不及时有力地加以干预，将会出现剧烈震荡甚至爆发战争，和平渐进这条路将越来越窄，日本所面临的威胁将越来越大，甚至可能失去战后通过长期发展所获得的和平与繁荣。二是关于日本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定位，谋求从国际秩序的追随者向桥梁、建议者、引领者转变。进入 21 世纪以来，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修正现行国际秩序中的不利成分、增加有利成分，是其中重要内容。三是在调整方向上，维护和完善“自由国际秩序”中的“经济自由”“制度自由”和“价值自由”。日本从国家权力秩序角度，积极思考如何打造涵盖中国、规范中国行为的秩序，为此，在美国领导力衰退情况下，与东盟、澳大利亚、印度、欧洲等所谓享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协调。四是在新国际秩序的塑造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以维持日本“21 世纪一流国家”地位。日本经济总量在 2010 年被中国反超，此后两国差距逐渐扩大，特别是日本由于少子老龄化趋势难以逆转，其经济实力持续相对下滑将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正如安倍在美国发表演说时所宣称的，日本“永远不会”主动退出一流国家行列。^① 日本要因循特殊的大国化路径，以“质”和“智”取胜，谋求成为影响国际秩序走向的重要变量。

（二）日本应对国际秩序危机的手段与路径

第一，主动因应中美博弈，扮演“积极作为的战略平衡手”。战后，日本国际秩序观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今后日本在国家战略层面仍然会加强日美同盟，并将之视为国家安全与地区和平的基石。日美同盟在日本国内有很强的社会舆论支撑，2020 年 2—3 月份的 NHK 舆论调查显示，七成日本民众认为日美同盟应该“维持和加强”。^② 日本仍然自认是美国的合作伙伴、自由阵营的一极。与此同时，鉴于中美关系是国际秩序及其调整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日本需要在中美博弈中寻求主动，妥善处理与中美两国关系，以确保自身繁荣发展与生存安全。

日本努力在中美之间扮演一种“关键变量”角色，占据一个既安全又便

^① 安倍晋三「日本は戻ってきました」、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223speech.html [2020-12-05]。

^② 「『トランプ再選は悪影響』NHK 世論調査」、NHK、<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statement/36851.html> [2020-12-05]。

于获利的位置。面对中国，日本的基本方针是“塑造”和“规范”其崛起进程。面对日美同盟，日本采取“绑定但不局限于”的基本方针，既以同盟为倚靠，又将其置于日本利益需要之下，防范与美过度捆绑造成“同盟困境”风险。

日本欲在中美博弈中扮演“两面人”角色，充当战略平衡手。一方面，日本对中国崛起疑惧重重，而自身国债居高不下，防卫与社保争预算，无法自行弥补“脱美”造成的安全系数下滑，为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摆脱美国战略轨道。另一方面，展望“后疫情”时期，中日两国在重振经济方面合作空间巨大，中国市场将成为拉动日本经济的为数不多的外部要素之一。因此，为应对中美关系及国际秩序变化，日本要做“积极作为的两面人”，而不是“消极无为的两面人”，要对美对华展开不同性质的对冲。对日本来说，对美对冲是应对美国放弃维持旧有秩序和地区干预而转向“本国中心主义”、停止提供公共产品的风险。^① 对华对冲则是应对中国对外姿态中所谓“协调性弱”“具有明显高压特征”和“可能采取攻击性行动”的风险。^② 日本对美奉行“建设性追随”路线，通过增加战略自主性，将美国因素转化为实现本国目标的战略性工具。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华采取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双轨战略，通过合作拉动经济增长，同时有效“规范”中国，在日中美三角中显示追随美国对华牵制的姿态，但在具体措施、实施力度上又与美国拉开一定距离。日本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对华示强，另一方面持续拉紧对华经济合作纽带，试图将中国纳入其构建的国际机制中，对华实施“制度制衡”。这既是日本出于防范中国的需要，也是鉴于中国庞大体量和国际影响力，确保相关机制运行稳定的有效战略举措。^③

第二，坚持价值观外交，在国际秩序重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日本一贯注重软实力的使用，强调自由民主价值观在应对国际秩序变动中的作用。兼原信克把 21 世纪日本的价值观总结为：法治、人类尊严、民主主义制度的重要性、和平、自由贸易。他认为这些价值观是从日本现代化 150 年历史中

^① 在日本战略界人士看来，即使特朗普离开白宫，“特朗普主义”也不会在美国消失。参见：佐々江賢一郎「『考察 米新政権』トランプ主義 消えない」、『読売新聞』2020 年 11 月 26 日。

^② PHP「新世界秩序」研究会『自由主義的国際秩序の危機と再生—秩序再編期の羅針盤を求めて提言報告書—』、2018 年、147—148 頁、https://thinktank.php.co.jp/wp-content/uploads/2018/10/20181025_01.pdf [2020-04-20]。

^③ 相关表述参见杨伯江：《世界大变局：日本战略认知与应对路径》，载宋志勇主编：《南开日本研究 2020》，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 年。

总结出来的，同时也是国际社会 500 年来伦理成熟的结果，日本应该向全世界传递这些价值观，为创建“超越国民国家的国际社会”做出贡献。^①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也强调日本所维护的国际秩序是“基于自由、民主主义、尊重基本人权及法治等普遍价值观或原则”。^②

与冷战后历届日本政府相比，安倍政府更强调日本是“自由民主国家”，刻意突显与美欧的共同点，更强调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伙伴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合作，强调为自由民主共同价值观的提升做出贡献。安倍政府提出的“印太构想”宣扬“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带有强烈的价值观色彩。日方战略学者认为，作为明治以来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提出愿景并被广泛接受的首个成功案例，“印太构想”实际是安倍执政时期为国际秩序重构提出的一种愿景。^③ 菅义伟上台后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安倍路线”，将外交首秀放在了越南和印尼，分别与之签署多个双边合作协议。他上台后发表施政演说时指出：“与东盟、澳洲、印度、欧洲等共有基本价值的国家合作，努力构建基于法治原则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④ 此外，宣扬所谓的“共同的价值观”已成为日本在南海地区增加存在感，并插手南海事务的重要手段。

价值观成为日本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手段。田中明彦把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分为三部分：日美欧“自由圈”、中俄“现实圈”以及非洲、中东国家等“脆弱圈”。“自由圈”对“现实圈”施策过程中，不得不采取“现实主义”行动。^⑤ 日本也因此积极开展价值观外交，表现在日美澳印四国机制，包括日本、菲律宾、越南和印尼在内的“小菱形包围圈”，以及日欧关系等各个方面。2020 年 10 月，日美澳印外长会谈在东京举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会谈中指出“各领域现存的国际秩序正在受到挑战”。他虽未明确提及中国，但是声称“我们四个国家拥有共同目的，即强化基于规则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对此，日本主流媒体认为：“菅政权将继承安倍政权的方向，一

① 兼原信克『戦略外交原論』、182—183 頁。

②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2013 年 12 月 17 日、http://www.cas.go.jp/jp/siryou/131217_anzenhoshou.html [2020 - 12 - 05]。

③ 細谷雄一「国際秩序形成 示したビジョン」、『産経新聞』2020 年 8 月 30 日。

④ 「第二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https://www.kantei.go.jp/jp/99_suga/statement/2020/1026shoshinhyomei.html [2020 - 11 - 05]。

⑤ 田中明彦「グローバルイシューで連携を」、『Voice』2020 年 4 月号、52 頁。

边通过四国合作实现与中国之间的力量均衡，一边谋求改善日中关系。”^①

在复杂国际局势中，日本采取主导立场，加强与拥有共同价值和规范的国家联系，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亚欧会议等多边地区框架中，重新确认这种价值和规范。日本认为与崇尚自由主义价值的欧洲进行合作尤为重要，希望与之联手形成“第三极”。在全球治理、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等方面，日本正加强与欧洲的协调与联动，并将此视为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坚信，冷战后30年里日本展开的价值观外交增加了自身对外政策的选择，使日本有能力在今后的新国际秩序构建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② 2020年5月，有日本学者在评价各国抗疫表现时说，因初始阶段应对疫情失误，美中两国都不是赢家，因此很难携手引领“后疫情”时期国际秩序的形成，“美中以外的世界”可能是关键因素，而最可能的组合是日本与欧洲。新秩序可能由美、中、日欧三极的合纵连横来形成。^③

第三，强化规则运用，从规则遵从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鉴于国际秩序面临危机和挑战，日本旨在构筑“自由、公正、以透明性的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外交^④，参与规则制定是日本外交的重要功能。安倍2014年提出的“海洋法治三原则”和“印太构想”所确立的“法治”原则都是日本“规则外交”的体现，但这一点表现最突出的领域还是关乎日本生存和繁荣的经济领域。在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特别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缺位，将日本推向全球经贸合作最前沿。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蔓延的背景下，作为多边自由贸易政策的“优等生”，日本将自身定位为“自由贸易旗手”，一方面以WTO为核心，强调全球经济规则；另一方面力争在构建新型广域经济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成为制定“全面、均衡、高水平规则”的引领者。

在日本看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实现可预见、稳定的贸易投资环境的重要基础，是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保障。但是，新形势下的WTO无

① 北见英城：《日美澳印欲以4国框架牵制中国 日本则谋求兼顾改善日中关系》，<https://asahichinese-j.com/world/13795936> [2020-10-20]。

② 鈴木一人「日本はリベラル国際秩序の担い手になりえるのか」、『国際政治』2019年3月号、130—131頁。

③ 船橋洋一・細谷雄一「『ポストコロナ』米中いずれも勝者になれない訳」、<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349171> [2020-11-01]。

④ 茂木敏充「第1回東京グローバル・ダイアログにおける茂木外務大臣外交政策演説」、『国際問題』2020年4月号、15—16頁。

法满足全球经济发展需求，三大主要功能均遭遇挑战，尤其是根据全会一致原则，新规则制定变得困难，也难以对不遵守规则的国家进行惩罚。^① 2019 年 6 月 G20 大阪峰会发布共同宣言，提出“可信赖的数据自由流通”（DFFT）概念，即“在确保隐私和安全相关的信任的同时实现数据的自由流通”。日本积极推动 WTO 以“大阪共同宣言”为基础制定数字经济规则，与相关国家进行谈判。目前参加谈判的成员国已增至 83 个，谈判主题包括“自由化”“可靠性”“简单化”“市场连接”“电气通信”“跨领域事项”等六个方面。^② 可见，日本注重概念的提出、理念的创新、观念的领先，以此推动国际社会的议题设置、标准制定，抓住规则制定引导权。在设置政策议题方面，日本注重引导 WTO 改革的讨论方向，表现出极强的战略主导意识。

在影响国际秩序调整的方向上，日本反击贸易保护主义论调，坚称解决全球化负面问题的策略恰恰在于自由贸易，主张稳步有序推进“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欧 EP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三大巨型 FTA，维持和强化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CPTPP、日欧 EPA、日美贸易协定、RCEP 打造了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六成的“自由经济圈”，日本认为自身在其中发挥了枢纽和核心作用。虽然美国没有参加 CPTPP，但是日本通过日美贸易协定将美国与“亚太自由经济圈”连接起来。^③ 在保护主义蔓延的情况下，日本希望把新兴国家也纳入规则框架内，确保对等的竞争条件（level playing field），创造日本企业活跃的舞台。在中国表态“积极考虑”加入 CPTPP 后，日本表面上持开放态度，但对中国是否能够接受 CPTPP 的高标准持怀疑态度。

对日本来说，巨型 FTA 有三方面作用：其一，巨型 FTA 不是“线”，而是“面”，有利于日本企业供应链的强化，活用原产地规则能使日本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其二，有利于规则统一。倘若各个 EPA 都制定不同规则的话，就显得无比烦琐。通过巨型 FTA，在投资、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广泛的领域制定共同的规则，根据法治原则，统一实施，有利于国际标准的形成。

① 黒田淳一郎「WTO 改革に向けた わが国の取り組み」、『日本貿易会 月報』2019 年 10 月号、<https://www.jftc.jp/monthly/archives/001/201910/ba0c15224e51b0990a73e08b48ae138da.pdf> [2020 - 11 - 01]。

② 外務省「第 4 回 大阪トラックって何？ どこに続く道のり？ デジタル経済の国際的なルール作り」、2020 年 2 月 7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cm/it/page22_003424.html [2020 - 11 - 01]。

③ 茂木敏充「第 1 回東京グローバル・ダイアログにおける茂木外務大臣外交政策演説」、『国際問題』2020 年 4 月号、15—16 頁。

其三，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巨型 FTA 能够通过多国谈判，在劳动力、环境等全球化带来的负面问题上也进行更高层次的应对。这些领域往往与各国内政紧密相连，通过巨型 FTA 能够实现双边 EPA 无法达到的高水平规则。^①

第四，强化经济安全，防范秩序震荡带来的次生风险。在国际秩序变动、不确定性增加之际，日本为确保自身生存与安全，维持自身稳定，尽力将国际秩序变动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更加注重把经济与外交、安全紧密挂钩。日本经济外交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保障资源、能源和粮食的稳定供给，二是应对日本因少子老龄化社会构造而导致的国内市场缩小，确保海外市场，能够把企业在海外获得的利益返还国内。^② 自民党税制调查会会长甘利明撰文称，围绕高科技的国家间竞争今后也将持续，甚至会加速，因此自民党税制调查会和“规则形成战略议员联盟”将大力推进“经济治国策”（economic statecraft）。也正是在此背景下，2020年4月日本模仿美国在国家安全保障局（NSS）下设立了经济班。

2020年6月，自民党成立“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政调会会长岸田文雄任本部长，甘利明任座长。该机构旨在中美对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形势下，推动带有前瞻性的讨论，包括日本的国际战略、国内新技术的活用手法、国民的连带感和一体感培养等方面。该机构向日本政府提议仿照美国、英国、欧盟做法，面向处理机密和最先进情报的民间负责人实行资格制度，给予民间人士对应机密等级的信息接触资格。如果不完善与欧美同样的资格制度、信息持续泄露的话，“日本有可能随时被国际共同研究和数字零件供应网排除出去”。^③ 由于担忧“数字监视型、国家资本主义型新国际秩序正在发展”，该机构建议日本制定《经济安全保障一揽子推进法（暂定名）》，制定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还建议日本逐步加强与美国建立共享信息的体制，加强对机密信息的管理，参与英语圈五个国家机密信息共享框架“五眼联盟”。^④

目前，日本经济安全政策从政府向企业、学术界渗透，日益形成政府企业联动的态势。2020年10月，三菱电机新设了“经济安全保障统括室”，负责公司整体风险管控。该部门由社长直辖，跨部门调查各国关于出口限制、

① 山野内勘二「メガFTA—自由で公正な貿易・投資を世界へ—」、『外交』2018年7・8月号、60頁。

② 大林剛郎・宮家邦彦・古城佳子・椋田哲史「わが国経済外交のあり方」、『月刊経団連』2015年7月号、35頁。

③ 「最先端情報に資格制を デジタル化へ不可欠—自民・甘利氏—」、<https://goodbye-ristora.com/20831.html> [2020-11-01]。

④ 「経済安保推進法制定を = 国家戦略確立へ中間まとめ—自民、政府に年内提言へ—」、時事通信社、<https://trafficnews.jp/post/100357> [2020-12-01]。

投资、人才、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政策动向和法律制度，防范经营风险。在学术界也出现了该动向，日本自民党议员长尾敬等强烈批判日本学术会议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保持合作，不配合国家安全政策。

第五，增强科技领导力，保持“战略不可或缺性”(strategic indispensability)。中美战略竞争尤其突出地体现在高科技领域。新冠肺炎疫情非但没有使中美对立缓和，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使两国因价值观不同而形成的深层次对立也随之加深。在此背景下，日本提出要在高科技领域确保“战略不可或缺性”。日本意欲在关键性高科技领域中获取有利位置，像欧盟增强“战略自律性”那样，管控过度依赖其他国家的风险。技术上的战略不可或缺性可以强化日本在国际政治和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提高其他国家在日本施加压力的门槛，确保日本根据自身价值观和国家利益采取行动，扩大对外施加影响力的空间。对于同盟国美国，日本拟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重要产业领域、数字货币等广泛领域制定共同战略目标，确立与美国在高科技争霸时代的战略一体性。对中国，日本则计划在安全及与人权相关的领域严格限制技术流出，而在其他领域如老龄化、环境、传染病等重要社会课题上提供技术支持，提高日本的国际影响力。^① 2019 年，由于在二战劳工赔偿问题上没能达成一致，日本政府突然宣布对韩国实行经济制裁，限制日本半导体材料、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 以及显示面板材料的对韩出口，就是日本在高科技领域显示“战略不可或缺性”的一种表现。

在高科技领域，日本表现出很强的战略前瞻性和进取性。安倍执政时期制定了日本增长战略，其目标是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克服少子老龄化问题，在世界率先实现“社会 5.0”(Society 5.0)。在物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对社会现状存在影响的新技术取得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将这些尖端技术运用于各产业和社会生活，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课题的解决，在少子老龄化的情况下依靠创新来拉动经济增长。

当前各国普遍认为，技术革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日本积极布局，欲在此次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从而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提出，日本将与欧美各国合作，集中投资研发最先进“6G”通信标准，力争实现世界首个产品化和国际标准的形成；率先制定《产业数据利用推进法（暂定名）》；与

^① 金子将史「『戦略の不可欠性』を確保せよ」、『Voice』2020 年 6 月号、52 頁。

欧美国家协调，尽早导入和流通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敦促政府和日本银行做好准备修改相关法律。^① 菅义伟上台后，任命平井卓也作为“数字大臣”，拟设立“数字厅”，将其作为跨省厅推进数字化的机构。可见，日本通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加强提前布局，意图通过确保自身在高科技领域的战略不可或缺性获取在外交层面议价的资本，从而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引导国际秩序往自身希望的方向发展。

总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日本为在新形势下确保国家利益，积极致力于提升对外“综合战略活跃度”^②。日本与国际秩序的互构关系既体现了历史延续性，又呈现出新特点。其延续性体现在：当前日本的国际秩序观转型是外部压力倒逼、内部因应求变的结果。日本一方面维持战后以来的“经济中心主义”与“和平主义”，另一方面为了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获胜，在新秩序中立足，坚持与秩序最强者进行战略合作，依托强者参与秩序，甚至在强者缺位时积极出头，谋求主导。日本与国际秩序的互构关系的新特点表现为：愈发由被动转向主动，由消极转向积极，扮演的角色向“战略平衡手”和规则制定者转变；谋求战略自主性，坚守日美同盟，但又不受其束缚，积极开展价值观外交，意图在国际秩序重构中发挥领导力；通过保障经济安全和发展高科技，加强对当前国际秩序变动中不可预测风险的管控。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从前近代、近代、二战后到新时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认知与战略应对的基本逻辑为：国际秩序变革深刻影响日本战略行为，日本往往倾向于主动而非消极应对挑战，最大限度地影响秩序重构的进程和方向。无疑，这一国际秩序变革与日本战略行为的互构关系值得学界高度重视并深入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巨匠卡尔认为，历史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对话。^③ 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考察国际秩序变革期日本与世界的关系，可发现一条比较清晰的运行轨迹：“华夷秩序”中的日本，在尊崇秩序中心的同时努力维护自身

^① 「経済安保推進法制定を = 国家戦略確立へ中間まとめ—自民、政府に年内提言へ—」、時事通信社、<https://trafficnews.jp/post/100357> [2020-12-01]。

^② 参见杨伯江：《世界大变局：日本战略认知与应对路径》，载《南开日本研究 2020》，第 9 页。

^③ 相关内容参见 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

独立性。而面临西方冲击，日本谋求摆脱、参与颠覆华夷秩序，实现“脱亚入欧”，继而又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追随者转化为挑战者。二战战败后的日本，积极拥抱强者，追随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战略性借助日美同盟，重经济、轻军备，在不断实践中审时度势、保持动态调整、努力趋利避害。实现经济繁荣之后，日本不断谋求将经济影响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并力图进一步影响国际秩序，从而由国际秩序追随者向引领者转变。百年大变局下的日本，面对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以“保障安全”“繁荣经济”“维护价值”三位一体的国家利益为纲，努力改变自己，重构对外战略，在“积极和平主义”方针指引下，谋求在特定领域引领新时代国际规则制定。

大变局下，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愈发成为国际社会的最大期待，日本也决心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甚至领导力^①，推动建构其所标榜的“以自由、公正、透明性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应看到，近代以降日本主流国际观更多地体现为福泽谕吉所极力倡导的“文明观”，这既是将压力变为动力乃至化危为机的日本式战略行为的思想根源，也是当代日本深陷“周边困境”等国际矛盾的深层肇因。日本外交无疑正在经历新的历史性考验，日本政治家应从历史中汲取走向未来的智慧。从历史经验看，日本加入东亚体系内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参与维护秩序稳定运转的动力源于体系内有序的合作机制，以及文化上的认同与归属。为此，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地区多层次合作，努力构建历史与文化认同，将有助于推动日本融入东亚、实现各方协调发展的进程。

（责任编辑：唐永亮）

^① 「第二百四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https://www.kantei.go.jp/jp/99_uga/statement/2021/0118shoshinhyomei.html [2021-01-22]。